ISSN：3080-2660
EISSN：3080-2679

目的论视角下成都博物馆文物名称英译研究

杨入瑜 周丹强玉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41400

摘 要：本文以成都博物馆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中的中英文物名称为研究对象，在整理展厅展签和官方网上展厅语料的基础上，依据文物名称中的材质、器形、纹饰、铭文和年代等要素进行分类，并结合翻译目的论的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分析代表性译例。研究发现多数译名能够传递文物的材质和基本器类，但部分译名存在中心词选择不准、同类术语处理不一致、铭文仅作音译而缺少释义以及英文结构不规范等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优化对策，以期改善文物译名质量，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关键词：文物名称翻译；翻译目的论；成都博物馆；翻译策略

DOI：10.64649/yh.jydk.issn3080-2660.202611042

0 引言

全球化推动跨文化交流，“一带一路”等政策助力我国文旅对外开放。成都积淀了丰厚的古蜀与巴蜀历史文化资源，入境游客持续增加。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位于成都博物馆二至三层，按照先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和明清四个阶段展示成都古代历史文化，是海外观众了解成都历史与巴蜀文化的重要窗口。文物名称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还承担着文化阐释、历史语境还原、适配受众认知的多重功能。本文以该展览线下展签与线上展厅文物中英名称为语料，选取典型译例开展研究。

1 文献综述

国内文物翻译研究聚焦翻译准则、文化传递与术语规范。刘庆元（2005）主张文物翻译兼顾“信”“达”；林文涛（2013）强调统一译规的重要性。不少学者引入目的论、生态翻译学开展案例研究：朱安博、杨艺（2017）以国博文物为例，验证音译加注、归化异化结合策略的有效性；吴敏焕（2009）指出考古词汇翻译不能照搬词典释义，需结合历史背景。亦有学者针对文物修复、展陈解说文本开展细分研究，拓展研究边界。

博物馆翻译是文化外宣的重要途径。早期研究重在译文纠错与术语标准化，许晓艳、田昌（2009）发现国内展陈解说普遍存在误译、文化缺省问题。后续学界引入接受美学等理论拓宽研究视野，胡富茂、宋江文（2022）从语域变异视角分析博物馆文本语体，为译法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撑。现有成果多围绕国家级博物馆，面向地方博物馆、古蜀文物译名的实证研究尚有缺口。

翻译目的论为德国功能翻译学派核心理论，包含目的、连贯、忠实三大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要地位，翻译策略需服务译文在目标场景下的预期功能；连贯法则要求译文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便于受众理解；忠实法则强调译文与原文保持合理关联，连贯与忠实原则均服从翻译目的。该理论适配博物馆文物翻译：文物译名既要保留本土文化特质，又要考虑海外受众有限的历史知识储备。朱安博（2017）对“乳钉纹方鼎”的研究表明，拼音“ding”加注的译法兼顾文化专有项保留与可读性，契合该理论。本文以此为框架，分析成都博物馆文物译名。

2 成都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文物名称特征

2.1 使用考古规范术语

大量文物名称使用标准化考古学术语，保证学术严谨性，器物的功能分类与形态描述都依靠精准术语实现。“材料 + 器型”是最基础的命名模式，多用于形态、功能清晰的器物，追求简洁明了，广泛运用于考古登记、博物馆图录以及学术研究，强调简洁与体系化分类。

该命名模式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标明器物材质，如青铜、陶瓷、玉石；第二部分根据器物形态、功能划分器类，如矛、戈、镜。例如“铜矛”（Bronze Spear）、“玉镯”（Jade Bracelet），均属于此类。该类术语可以高效传递器物材质等基础信息，减轻长名称的阅读负担。

除此之外，文物名称常加入朝代纪年信息。例如“西汉漆耳杯”（Lacquer EarCup, Western Han Dynasty）。标注朝代可以提供清晰时间线索，帮助参观者定位文物的历史坐标。

2.2 使用文化负载词

部分文物名称包含承载丰富历史背景与象征内涵的文化概念。其中一类典型文化负载词来自神话意象。例如“龙纹琉璃滴水”（Colored Glazed Tile with Dragon）龙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丰富的符号，其象征意义随时代、器物类型与使用语境动态变化，其中一项核心寓意

ISSN：3080-2660
EISSN：3080-2679

即为封建皇权的象征。

还有些文化负载词来自社会官制与等级制度。例如“‘别部司马’铜印”（Bronze Seal of with Characters of“别部司马”(Biebu Sima)），中国古代官制体系等级森严，“别部司马”是汉代军职。

另外还会有许多寄托特殊文化内涵的文化负载词，例如“‘天下太平’金冥币”（Gold False Coin with“World Peace”），“天下太平”寄托古人对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冥币不仅是随葬明器，更是文化价值观的载体。

2.3 涵盖多重信息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名称信息量大，命名要素可以包含年代、产地、材质、器型、纹饰等多重信息。

瓷器是中国文化瑰宝，其命名充分体现命名体系的复杂性。例如“景德镇窑青白釉斗笠瓷碗”（Greenishwhite Porcelain Bowl with BambooHat Shape from Jingdezhen Kiln），“景德镇”代表产地，“青白釉”描述釉色质感，是器物核心特征，“斗笠”描绘器型，便于识别分类。

丝织品命名中含有大量花鸟纹饰细节描述性词汇。例如“红地团花对鸟纹锦”（Brocade with Flower Clusters and Confronted Birds on Red Ground），名称中包含颜色和对纹样清晰的描写。

3 成都博物馆文物名称英译策略分析

3.1 直译

直译是在目的语表达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保留原名称中的材质、器类、形制和纹饰等基本信息。直译并不要求词语之间机械地一一对应，而应首先保证中心词准确、修饰关系清楚。在目的论框架下，直译契合连贯原则，保障译文在目标文化中通顺可读。例如“铜矛”（Bronze Spear）、“铁刀”（Iron Cutter）。译者在准确理解原文基础上选用目的语合适表达，既规避误解，也适配目标语语境。直译在成都博物馆文物翻译中十分常见。

但直译有时容易丢失文化内涵，例如“铜有领璧形器”（Bronze Collared Disk），“有领璧”是古蜀文化极具时代与地域特征的器物，属于古蜀国重要礼器。直译译文基本呈现了器物的形制特征，但其历史意义无法仅依靠直译传递，需要补充注释与背景介绍帮助受众理解文物文化价值。

3.2 意译

当源语名称中的文化概念在英语中缺少直接对应的词时，可以采用释义或说明性翻译，在准确传递核心信息的基础上降低受众的理解难度。意译在文物名称翻译中使用时不能脱离文物的实际性质，也不能为了便于理解而改变文物身份。

例如“青铜力士像”现译为 Bronze Statue of Hercules。然而，Hercules 是希腊神话人物的专名，“力士”则是中文文物定名中的一般称谓。除非造像的图像特征和考古材料能够证明其表现的确为赫拉克勒斯，否则这种译法会改变文物身份。较稳妥的译法可以根据造像性质采用 Bronze Figure of a Strongman 或 Bronze Guardian Figure。该例表明，译文的可理解性不能以牺牲文物信息的准确性为代价。

3.3 音译

针对难以转译的中国文化专有名词，馆方常采用音译保留原词读音。如“‘千万吉昌’云纹瓦当”（Eaves Tile with Pattern of Clouds and“千万吉昌”(Qianwan Jichang)），译文仅保留铭文与拼音，未阐释铭文内涵，海外受众难以获取有效信息，可调整为 Cloud-patterned Eave Tile Inscribed“Qianwan Jichang”，并在展签补充其寓意长久吉祥。又如“‘定平一百’铜钱”（Bronze Copper with characters of“定平一百”(Ding Ping Yi Bai)），Bronze Copper 未能准确标识器物类型，应改为 Bronze Coin Inscribed“Dingping Yibai”；若版面允许，还可标注该文字为钱币铭文。直接音译四字铭文而不加注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且两例拼音拼写格式尚不统一。

故而文化负载词宜采用音译加注策略，契合目的论忠实法则，在保留源文化特征的同时保障可读性。典型案例如“铜甑”（Bronze Zeng (Steamer)）、“铜鎏”（Bronze Ou (Wine Vessel)）、“‘蜀郡工官’铜盆”（Bronze Basin with Characters of“蜀郡工官”(Shu County Bureau of Workmanship)）。

然而简短括号注释难以承载复杂历史文化信息，部分文物内涵需依托展板文字补充。以“虎钮铜錞于”（Bronze Chunyu with Tiger-shaped Handle）为例，展板补充说明其为古代军队与鼓配合、用以指挥进退的打击乐器，点明器物功能。

4 文物名称翻译现存问题与改进对策

4.1 文物名称翻译现存问题

通过直译、意译、音译加注多种策略，成都博物馆文物名称英译兼顾考古定名的严谨性与文化内涵的可读性，为博物馆文物跨文化传播提供实践参考。但现有译文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4.1.1 翻译标准不统一

文物翻译不存在唯一固定版本，但同馆译文应当遵循统一原则。通过语料分析发现，成

ISSN：3080-2660
EISSN：3080-2679

都博物馆同类器物存在译文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同为“铜壶”的器物分别译为 Bronze Pot 和 Bronze Hu (Vessel)，反映出馆内对“壶”这一器类的处理尚不统一。相比之下，“带流铜壶”（Bronze Ewer With Slanting Spout），因具有流口所以译为“Ewer”。馆内可在文物专家确认器类的基础上，将一般礼仪用铜壶统一译为 Bronze hu (ritual vessel)。

4.1.2 译文关键文化内涵缺失

前文案例可见，成都博物馆诸多文物名称内含丰富文化负载词。部分译文仅单纯采用音译而未配套阐释，在四字吉语类铭文的翻译中该问题尤为突出，同时拼音转写形式缺乏统一规范。此类译名丢失了文物承载的核心文化内涵，易造成海外参观者理解障碍与认知偏差，违背了目的论指导下博物馆文物英译的交际目标。

4.2 文物名称英译改进建议

4.2.1 统一馆内翻译规范

统一翻译标准，不等于为所有文物制定唯一固定译文。文物翻译本身存在学术争议，不同使用场景翻译目的不同，很难在全国层面制定一套万能译法。但同一博物馆内部，同类器物应当保持翻译标准一致，翻译策略统一，规避“铜壶”一类一物多译的割裂现象。

4.2.2 参考平行文本

文物名称往往包含专门的器物类型和考古术语，只看词典释义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英文表达。翻译时可以参考海外博物馆的藏品说明、考古图录和相关英文研究，了解同类器物通常如何命名，再结合成都博物馆所藏文物的形制和用途作出判断。这样既能减少望文生义，也便于同类名称采用较为一致的表达。不过，各博物馆藏品的年代、形制和定名依据并不完全相同，已有译名不能直接套用。平行文本主要用于提供术语参照，最后采用哪一种译法，仍应以文物本身的信息为准。

4.2.3 面向受众增补阐释信息

博物馆是“文物 – 文本 – 观众”三者交互的空间。文物名称应保持简洁，但是否省略纹饰或形制信息，必须以不影响器物识别和同类文物区分为前提。难以纳入名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信息，可以转移到展签说明、语音导览或数字页面中呈现。考虑到海外参观者对中国历史认知有限，站在传播中华文化的立场，涉及历史人物、地名、职官的内容，译文应当补充说明。如果内容较多可以在展览板中补充。

5 结论

本文以翻译目的论为理论框架，选取成都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300 余组文物名称中英对照语料开展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该馆文物定名以标准化命名为主，部分定名承载神话意象等文化专有信息，多重信息叠加造成文本结构复杂；馆方主要采用直译、意译、音译三类翻译策略，各类策略各有适用边界：直译可还原器物形态，但难以传递象征内涵；意译易因文化归化产生语义偏移；单纯音译易引发信息缺损，需辅以注释，方可兼顾文化专有项保留与海外受众可读性。研究同时发现译文存在标准不统一、文化内涵流失等问题，据此从统一术语规范、参考平行文本、面向受众补充阐释信息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以期达成博物馆文物英译的跨文化交际目标。

参考文献：

[1] 胡富茂，宋江文．中国博物馆翻译文本的语域变异多维分析 [J]. 外语电化教学，2022(5): 31–36, 109.

[2] 林文涛．文物翻译的规范化探析 [J]. 四川文物，2013,(4):86–89.

[3] 刘庆元．文物翻译的“达”与“信”[J]. 中国科技翻译，2005,(2):41–43+5.DOI:10.16024/j.cnki.issn1002–0489.2005.02.011.

[4] 吴敏焕．谈考古词汇的翻译——以汉阳陵遗址博物馆出土的文物为例 [J]. 考古与文物，2009,(4):103–104.

[5] 吴敏焕．顺应论视角下陕西博物馆文本的汉英翻译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0(5):175–176.DOI:10.16152/j.cnki.xdxbsk.2010.05.026.

[6] 许晓艳，田昌．博物馆陈列介绍的翻译失误与修改 [J]. 大众文艺（理论），2009,(21):10–11.DOI: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09.21.008.

[7] 朱安博，杨艺．国家博物馆文物翻译实证研究 [J]. 中国科技翻译，2017,30(3):45–48.DOI:10.16024/j.cnki.issn1002–0489.2017.03.013.

作者简介：杨入瑜（2003.03—），女，汉族，四川蒲江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笔译、翻译理论与实践。

周丹强玉（1986.09—），女，汉族，四川德阳人，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文化、翻译。